

出土文献与 中国文学史研究

CHUTUWENXIANYU
ZHONGGUOWENXUESHIYANJIU

汤漳平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土文献与 中国文学史研究

汤漳平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汤漳平

编 委 陈良武

郑礼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汤漳平主编.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215-07427-9

I. ①出… II. ①汤… III. ①出土文物-文献-中国
-学术会议-文集②文学史-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7.04-53②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63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中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75

字数 40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目 录

对新十年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代序)	汤漳平	1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前前后后	姚小鸥 李 颖	7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	赵敏俐	12
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	崔恒华 周建忠	18
出土文献的贡献和学术史改写的困难	蔡德贵	25
出土文献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三大作用	郑杰文	29
出土文献与文学史研究	王培元	41
先秦神话与出土文献研究综述	涂敏华	44
女娲生育生殖神话与考古发现	涂敏华 程 群	58
《山海经》太阳鸟神话的考古印证及其文化内涵	涂敏华	69
关于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郭 丹	76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王洲明	82
战国纷乱与《诗经》传本的歧出	刘毓庆 郭万金	92
“清华简”与《尚书》	陈良武	99
《春秋事语》与《左传》类经学文体特征的再认识	方 铭	110
礼与《左传》的历史观及叙事体式	赵 辉	131
《周易》、出土《易》学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	郑晨寅	143
出土文献与《论语》研究	陈良武	153
为老子《道德经》正名	陆永品	166
老子劝人立德	陆永品	169
郭店竹书《老子》与儒道思想关系之辩	王朝华	173
论上海楚简《民之父母》的“五至”说	姚小鸥	190
《性自命出》:以思孟为主流的综合学说	郭常斐	197

出土文献与《荀子·成相篇》研究	陈良武	205
谈出土文献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杨艳华	215
朝华已披 夕秀方振	周建忠 施仲贞	221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汤漳平	237
出土文献释《远游》	汤漳平	248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郭常斐	259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近十年之研究	李晓琼	274
从《和箫集》看阮大铖早年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游	胡金望	280
出土文物可以深化更正对文本及文学史的看法	刘新文	285
从明刊说唱词话看宋元话本的文体特征	蔡一鹏	291
论尹湾汉简《神乌赋》对考查小说起源的意义	代顺丽	302
明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与《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述评	陈丽媛	308
“第二届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良武	320

对新十年出土文献与 文学史研究的思考^①(代序)

汤漳平

从1999年12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会
议至今,已过近十年时间。这是人类跨进新千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样
的时刻,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次认真的回顾与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
的。这也是我们在2008年12月再次举行“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讨论会的初衷。

过去的十年,在我国文化史、文物考古史上,堪称收获颇为丰硕的十年,
它延续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古代文献大量出土的势头,带给人们
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古代文献出土,大体可分为三
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中,最重要的是西汉
早期墓葬出土的一批古代典籍,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安徽阜阳双古
堆汉墓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简帛古籍,虽然这些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先
秦的著作,但由于墓葬时间多为西汉早期,因而对其成书时间,人们还难以
准确界定。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湖南慈利石坂村楚简、湖北荆
州的包山楚简、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书,使人们
的视野大开,将我国古代典籍埋藏的年代下限提前至战国中后期。

第三个时期为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年。这十年的最重要发现是湖南湘西
的里耶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
简。这十年的发现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数量众多。过去简帛的发现,一次能
够出土几百枚的,已算是大批出土了,而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就出

^① 本文系国家教育部2005年度社科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批号:05JA750.11—44031)。

出土十余万枚,里耶秦简也有一万余枚,清华简则有 2388 枚,这样大批量的出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二是填补空白。秦世不文,原来发现的秦简也数量有限,而一万余枚的里耶秦简,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文化专制的时代有更多的实际感受。这几批简牍的出土,使我国简帛使用的年代从先秦至三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当然,中国使用简帛为书写的文字载体时间更早,夏商两代均“有典有册”,我们可以期待将来会有更早期简牍的出现。三是这批典籍对中国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尤其是清华简。当然,不论秦简、汉简还是战国简,埋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古代典籍出土,本身就是异常难得,因而都是十分珍贵的。但是,如果仅有前四十年出土的资料,学术界同仁依然感到遗憾,因为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一部古籍《尚书》还未露面,因而有的学者在著作中充满期待地表达希望能够早一日见到竹简《尚书》,因为这是古代文化的“龙头”。清华简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2388 枚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刚刚整理发表的《保训》篇,保存周文王对武王的临终遗诫,同时出现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周初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时间跨度达七百年,其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

随着大批古代典籍的问世,最近十年的相关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1 年年底,随着上博简第一批整理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孔子诗论》立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至今,这批简文已出版七批,其丰富的内容,自然引起学术界各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十年来,以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史、政治思想史、法律、方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论文和著作也纷纷出现,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这里特别关注的是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首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时,我们深感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诸多学者,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知之甚少,研究相对薄弱,研究理念也相对滞后的状况,因此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以提倡和促进。

在本次会议之后的十年间,我们高兴地看到,关心这一领域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关注面也越来越广,从申报各级的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到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都可以看到与这一领域相关的研究项目。我们的文学史著作已经较多地关注和利用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资料来加以论述,就是再版的文学史专著,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 2002 年的修订本中

“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①。同时,已有部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中国文学各领域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版,其内容的涵盖面广,从先秦直至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等。至于学术论文,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这种局面,显示了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已经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最新的前沿成果来从事本领域的研究。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重视和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上,究竟应当继承 20 世纪 20 年代顾颉刚等以“疑古”为出发点的“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呢?还是继承王国维所提倡的以“二重证据法”来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从而真正“走出疑古的时代”(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出土文献资料能否重新改写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这场争论看来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事实上最近一个时期,已在期刊上、网络上展开了。有的学者开始着手探讨 20 世纪 20 年代“古史辨”派产生的思想根源,认为它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的主流史学实证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实证史学,宣扬天皇史观,鼓吹日本优越,而蔑视中国与朝鲜,轻视中国历史,其代表学者如白鸟库吉曾写有“尧舜抹杀论”,否定中国上古史。而有的学者则对当前影响甚广的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表示保留。并进而对学术界广泛认同的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如何运用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其实是不利于思想史的‘改写’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促使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②此外,还有如《“走出疑古”的困惑》^③等。

当然,对“走出疑古时代”表示怀疑和保留的不仅是中国的学者,《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登载有日本学者谷中信一的文章《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文章中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学术界当前学术动向的担忧,文中说:“难道疑古主义的历史使命真的结束了吗?——这是我在 中国访问期间一直考虑的问题。”他还说,他以前上学时,一直受到这样的教导:“先秦文献的使用,这要非常的慎重,尽量搞清成书的年代,因为没有真正可以信赖的文献。”“我深受彻底的疑古立场的津田左右吉博士的学说

① 费振刚:《再修订后记》,《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59 页。

② 曹峰:《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 年第 5 期。

③ 张富祥:《“走出疑古”的困惑》,《文史哲》,2006 年第 3 期。

影响,所以对这种学术风潮有一种抵触的心理。”他在看到当前因大量出土文献资料的发现而使中国学术界“在思想史研究上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可说是迎来了先秦思想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状况时,表示担心说:“这种情形,却又令人苦涩地想到,那种传统的严密的文献考证到哪里去了呢?近年来这种大胆的风潮为什么会如此盛行,令人大感困惑。”^①当然,他在文章中不仅陈述个人的观点,也引用国内一些学者对这场争论的不同见解。谷中信一先生的看法,代表着国外为数不少的一批汉学家的观点,只是有的学者没有写文章表达而已,这种状况,令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日学者间关于“屈原问题”的那场争论。所谓“屈原问题”,不过是在整个“疑古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虽然经过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讨论,屈原否定论在国内可说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国外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日本学术界扩散出去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笔者参加学术会议时,遇到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仍然对历史上关于屈原的记载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或者依然认为,屈原不过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

“疑古”的观点,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早已有之的,其中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如东汉王充、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等。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一味信古,以为前人记载的便一切都对,恐怕中国的学术就难以向前发展了。我们当然不应故步自封,食古不化。但事实情况是,自20世纪初掀起的批判封建、否定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我国学术的各个领域,“疑古”之风盛行,甚或成为主流的思想,而其为当政者所接受,便影响到了政治的层面,影响到治国的方针,其严重恶果,则“文革”为甚。我们当然不能说,“疑古”思潮是直接造成“文革”灾难的恶果,但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说它与此有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对它进行一次总结,实事求是地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包括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科学地评价其历史的功过(坦率地说,以往对正面的功肯定过多,而对其过则往往一笔带过),客观地探讨其思想理论、研究方法的得失,应当是恰逢其时的。

不错,“走出疑古的时代”的提出,和过去盛行的“疑古”思潮是针锋相对的,也可以说,是对“疑古”思潮中缺乏科学性方面的反拨。国家所关注

① (日)谷中信一:《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第388—389页。

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过去“疑古”派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这种回答,不是靠空对空的争吵,它需要的是实证,需要有新的资料的出现和可靠的证据为依据,通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才可能说服人。半个世纪以来,大批大批珍贵的考古文物、文献资料的面世,使得这项工作的开展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尤其是中国文化方面,先秦的许多重要典籍,经秦火之后,大量湮灭无闻,而经汉人整理的传世典籍又因今古文经之争而引发种种疑窦,于是,两千多年前的众多学术积案不得其解,许多历史事件也若明若暗,而上古三代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也模糊不清,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从事中华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无不感到痛心疾首,希望能尽毕生之力使得这一难题得以破解。一个世纪以来,多少学者或奔走于田野荒山,进行艰苦的调查与发掘,或埋头于工作室,不分日夜地译释出土文献中的相关文字资料,破解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面对新出土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老实说,国内能够从事该项研究的人力是相当有限的,有的竹简已出土二三十年,至今还未能很好地进行整理,多数只能说还处于释简和文字处理的阶段,而深入的研究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说现在已经热过头了,未免十分幼稚。这使我想起这些年有关国学热的争论。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了个《百家讲坛》,是面对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观众设立的“讲坛”,其普及的意义可想而知,开设的效果确也不错,许多人踊跃听讲,这种状况反映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求知欲,而后,有的人借机进行商业炒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闹剧,于是便有人惊呼“国学热过头了”。我实在感到不可理解什么叫“热”?在旧中国,当时多数人都是文盲,然而,即使在农村,和年龄稍大的人讲话,他们还能随时引用一些《四书》、《五经》里的“子曰”来和你讲论对答,而发展至今天,号称全民文化普及率那么高,每年有上千万高中生、五六百万大学生、研究生毕业,然而,有几人熟悉这些中国古代的经典?更谈不上运用它们了。这种全民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现象,理应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考虑设置相应的课程,让学生从少年儿童时期便能接受这一方面的教育,这是关乎中国人人文性格养成的重要问题。而今我国这方面教育还远远没能开展起来,水温还在冰点以下,实在不知“热”从何来。同理,这数十年来,大批古籍出土,多者一次竟有一百余部(如上博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能够透过这些古代书籍,认识那样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等众多方面的状况,直接倾听那一代民众(主要是士人)的心声,通过研究,消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接与之

进行对话。可是,如前所说,国内真正懂得并从事研究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以至于有的学者不无担忧地说,如果我们不加紧培养相关人员,就会重蹈敦煌文学研究的覆辙,形成敦煌在国内,而敦煌研究在国外的怪现象。当然,时代不同了,外国人不再可能把我国新出土的文献资料成批地掠夺走。可是整理研究人员的稀缺,却可能使这些好不容易在地下保存几千年的资料受到二次损坏,甚至得而复失,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十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虽然令人鼓舞,但是,也依然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许多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的人员,对这一领域的情况不了解乃或知之甚少的状况依然相当普遍,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传授给下一代,这种现状亟待改变。我们的前辈学者,都十分关注出土文献的研究,并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近代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当代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最近有的学者还提出“第四重证据法”(叶舒宪)等等,虽然有争议,但它毕竟反映了研究方法的探求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是有意义的。我在首届会议上提出要“承继传统,开创未来”,承继传统,就是承继老一辈学者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开创未来,则是要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民族文化的弘扬作出贡献。目前国内兴起的“国学热”、“文化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不同的动机,但多数学者是抱着复兴中华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来做这项工作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曾经借助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宝库,中华文化的复兴、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也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追寻。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最古老的民族文化,我们从事的研究,却是最前沿的课题,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民族光辉的未来。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的前前后后

姚小鸥 李 颖

199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该报记者李丹撰写的消息《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报道了当年12月11日~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由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河南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规模并不算大,但它的召开却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它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和利用顿时形成风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的立项中,出土文献研究受到重视,大批有较高水准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还有大学设立出土文献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关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酝酿和召开,《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所刊登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笔谈》“编者按”有简要的说明。该编者按说:

近年来,简帛文献研究的进展,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相当的促动,不少有识之士表达了进行相关学术交流的愿望。1999年暑期,北京广播学院姚小鸥博士向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汤漳平研究员提出倡议,举办一次有关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汤漳平社长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并准备在《中州学刊》上选发会议的若干论文,组织相关笔谈。1999年12月11日至12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会议由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部、首都师大中文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会议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由于编者按的性质及撰写者的出发点,上述编者按对这次会议的缘起及过程的记述十分简略,事实上,会议的召开有着十分深远的学术背景。

大家知道,所谓出土文献,是指在墓穴、窖藏、洞窟等地下场所发现的古代文献。它的载体主要有甲骨、铜器、碑铭、陶瓷、简牍、缙帛等,也有中国传统的书卷与其他抄本。近年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大宗出土文献多为简帛材料。出土文献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从而受到学者的重视。出土文献的发现,在汉代已有记载,并成为当时学术派别之争的重要话题。汉武帝时期的孔安国曾利用孔子壁中所得古文《尚书》进行文献研究。晋代的杜预在注《左传》时已经利用了汲冢竹书的材料。近代以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文史研究取得成绩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是王国维先生。关于出土文献的重要意义,王国维先生曾有精要概括,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现者,固不自今日始也。(《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在整个 20 世纪,文史学科的多个学科分支的发展都得益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和利用。20 世纪初期出土文献研究所利用的材料除传统金石学曾经使用过的青铜器铭文及碑刻资料外,最为大宗的是 19 世纪末期发现的敦煌文献及甲骨资料。流沙坠简也间有使用。20 世纪前半期,出土文献已经在考古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术领域里大显身手。20 世纪中后期开始,出土文献的研究和利用更是大大促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进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睡虎地秦简》、《郭店楚墓竹简》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以及近来陆续公布的清华简等大宗出土文献的发现,引发了一轮又一轮出土文献研究的热潮。在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中国哲学史等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地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相比而言,中国文学研究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里则显得比较沉寂。

其实,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研究也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若干学术分支里,学者们对出土文献的利用也有着较为突出的成就。20 世纪前半期开始兴起的若干专门之学,如敦煌学中,就包含了不少古代文学的研究内容,其成就已为大家所熟知。80 年代以来,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学科分支如楚辞学的研究,就比较重视对出土文献材料尤其是楚简资料的利用。还有一些在专业归属上被认为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的某些研究也很值得重视。比如李学勤先生关于“放马滩秦简”的研究(《文物》1990.4)对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起源,裘锡圭先生关于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资料的论述对于汉代通俗文艺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总的来说,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对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大大落后于其他学科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落后状况主要是由于研究者的意识使然。而研究者意识的落后不但由于研究者相关知识的缺乏和视野的狭窄,更受到本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局限。

文学是综合体现一个时期人们思想、艺术和学术成果的文化载体。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术修养。诸如文字学(包括音韵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以及艺术学的广泛知识,都是一个合格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所应必备的。近代以来的前辈学术大师自王国维以降,莫不具有多方面的深厚修养。20 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恰当的过细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者学养的不足。在高等院校的古代文学专业里,设置课程目光狭隘,造成学生的基础薄弱。有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开始被划分为语言、文学等不同的专业。这样的专业设置思想培养出来的学生,深入研究的基础如何,可想而知。

上述诸因素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固然很大,但还不是古代文学研究长期滞后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长期落后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科理论的严重缺陷。50 年代以后,苏联引入的文学理论长期占据大学中文系的理论霸主地位,在方法上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羁绊。许多从事古代文学工作的人不明白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何在,不能理解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深入研究是把握对象精髓的基础。一些号称专家的人不清楚文献考据和义理之间的辩证关系,甚至误认为“考证”就是“资料工作”。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自然难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古代文学及其研究。严重的是,许多占据学术要津的人往往也持有这种大

有疑问的观点。在他们所主持的刊物上,带有赏析性的半普及性的文章成为重头戏。在现行体制下,这类刊物有着很大的导向作用,流风所及,后果不难想象。上述理论局限及其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早已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问题是如何以实务来匡正时弊。大家都在寻找富于时代特色的推进古代文学研究前进的学术突破口。加强在古代文学领域里的出土文献研究,就是推进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有力举措之一。

时代提供的契机、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兄弟学科的影响,使古代文学学科内部产生重视出土文献研究的要求。历史不过是借我们之手来具体发起这一学术运动罢了。

与时俱进的学术创新意识和学术同道的鼎力相助,是这次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两个重要因素。“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的前前后后,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许多学术单位和学术界朋友个人的巨大支持。北京广播学院、河南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文艺研究杂志社不但与我们联合举办了这次会议,还在当年第3期上提供了多达13页的版面发表与会学者的学术见解。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辽宁大学、山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曹道衡、董乃斌、张燕瑾、赵敏俐、廖奔、汤漳平、廖名春、方铭、许志刚、曲德来、金元浦、刘跃进、延保全、华锋等以及北京广播学院的蒲震元教授等有关人员共四十人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的记者。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李学勤先生本允诺参加这次会议,但由于出国访问,返程时因故耽搁未能如愿。他事后在《文艺研究》上撰文对这次会议的宗旨和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先生的文章开头说:“1999年12月,在北京广播学院召开了‘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从会议主题和内涵来说,都具有开拓性,我自获知这个信息开始,就感觉非常兴奋。”李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到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战国竹简中包括有关于孔子论《诗》的内容。两年后,这批竹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竟然有数百篇相关论文问世。这一空前未有的学术热潮,映衬出“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前瞻性。可以说,它就像一朵报春花,以其细小的

枝叶,率先向人们透露出了春天的讯息。

这次会议所倡导的出土文献研究,从材料、对象、方法到学术视野方面都对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年多来的相关学术发展,对这次会议的影响给予了最好的说明,会议论文集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也许能在另一个侧面上说明学术界对它的评价。这本名为《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出版后,在学术界受到极大欢迎,在大陆的一些地方,这本论文集很快脱销。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负责人林庆漳先生曾告诉我们,该所到扬州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学者们见到这本论文集后,每人都购买了此书。王子今教授曾告诉笔者,有港台学者委托他在大陆购买这本论文集。2008年,笔者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图书馆时,也曾在该馆藏书中见到这本论文集。几年来,《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所收录文章的内容,不断受到学术界的引用。“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学术会议。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

——从清水茂的《乐府“行”的本义》说起

赵敏俐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之巨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笔者在1999年12月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①然而在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文学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正确地将出土文献与现存历史文献有机结合,通过正确的分析鉴别而对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本文拟从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入手,就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行”是汉乐府歌诗题目中常用的一个词语,查沈约《宋书·乐志》,平调曲中有《短歌行》、《燕歌行》,清调曲中有《秋胡行》、《苦寒行》、《董逃行》、《塘上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大曲中有《东门行》、《折杨柳行》、《艳歌罗敷行》、《西门行》、《煌煌京洛行》、《艳歌何尝行》、《飞鹄行》、《步出夏门行》、《野田黄雀行》、《满歌行》、《棹歌行》、《雁门太守行》。郭茂倩《乐府诗集》则辑录了更多以“行”字为题的汉魏相和歌辞作品。正因为如此,什么叫“行”的问题也受到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如丘琼荪、逯钦立、王运熙、杨荫浏、李纯一等的论著中都有涉及。近年来更是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在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乐器中有“歌钟”和“行钟”及李纯一的相关考证文章的基础上写成,近年来颇受

^① 《文学前沿》第2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